

世界第一条地铁线的建成是一次轰动的成功。它投入运行的第一年就累计运载了950万名乘客,第二年这个数字则上升到了1200万。

托尔斯泰灾难般的笔迹经常难以辨认,甚至连他也无法释读

《战争与和平》

1869年

这部俄国伯爵创作的巨著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部手稿集,但只有他的夫人有能力释读这堆乱麻一般的手稿——她协助作者七易其稿,最终定稿超过50万字。许多评论家称,《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史诗级小说。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828—1910)花了四年时间写作这本小说。小说的背景时间设定于他出生之前的小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期间(1805—1813),稍晚于拿破仑对俄国灾难性的入侵(1812年)。这位俄国大师对文献和其他史料进行了艰苦的爬梳和研究,同时将他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个人经验作为细节融入其中,以使小说尽可能显得逼真。他也创造了一个精巧、虚构的叙事结构:俄罗斯的五大家族被卷入血腥的拿破仑战争,并经历了真实的历史事件。

托尔斯泰将这部小说中虚构的诸多人物置于与160名真实历史人物的互动之中,其中就包括了拿破仑。小说半是历史真实叙事,半是文学虚构,史诗般的语言中还蕴含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考。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内容都是托尔斯泰兼用法语和俄语写成。

但是,托尔斯泰灾难般的笔迹经常令人难以辨认,甚至连他也无法释读。世上唯一一人可以读懂这些手迹——他的编辑和抄写员、永不言倦的妻子索菲亚·托尔斯泰娅(1844—1919)。传记作者亨利·特罗亚后来形容她做了“力拔千钧的工作”,努力“破解这位巫师的魔法书,上面密布着一行行仿佛用力刮掉的文字。改写的文字互相串行,天天地脚满是咒语般的字块,麻烦的‘增补’文字弥漫于书页之间”。她将一页页手稿无数转换为初稿,同丈

夫一起工作,并对小说做了不计其数的修改。

小说的第一部初稿于1863年完成,第一个节选本则于两年后以“1805”的名义在一本杂志上面世,并持续连载。但托尔斯泰对小说并不满意,他想要一个不间断的全本。于是,他和索菲亚在1866年和1869年间数次重写了整部小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最终,小说的定稿于1869年出版,名字叫《战争与和平》。小说出版后,伊万·屠格涅夫、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古斯塔夫·福楼拜、维克多·雨果以及同时代的一些其他知名作家一致赞誉了它,将其称为杰作。尽管有一些评论家起初并不喜欢,但它的声誉却与日俱增。

托尔斯泰于1910年去世,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手稿集:包括165000页手稿,以及10000封书信。他最宏伟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仍然是文学史上最宏伟的巨著之一,并多次被改编搬上舞台和荧幕。

在1000多项发明之中,爱迪生称留声机为他的最爱

留声机专利证书

1878年

一名多产的年轻机械师,在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丧失了绝大部分听力。他进行了无数次实验,只为发明一种他口中的“会说话的机器”。他在专利申请上形容说,这个新装置“将天籁与人声永久保存,并且在未来,这些声音不仅可以复制,而且足以复现”。

1877年,这位狂热的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1847—1931)已经在新泽西州门罗公园的实验室里做过了无数次实验,只为改善通过电报和电话进行通信的质量。

(10)



同样的课,不同的老师教,为什么甲老师教的时候,学生就喜欢学,就能把这门课学好。而乙老师教,学生就不愿意学习,就学不好。除了老师教学能力的差别外,更多的与师生关系的密切程度有关。

二是家庭或幼儿园过早让孩子超前学习。让孩子在幼儿园阶段过早学习识字、数学和英语。到了小学以后,这些东西又不得不重新学一遍。刚开始上小学,就让孩子“吃剩饭”——重新学习幼儿园学过的内容。这样的学习,是不可能让孩子感兴趣的。往往那些在幼儿园学得快,学得好的孩子都是非常聪明的,都是很有创造力的。而重复学习,则会导致这些孩子对学习产生厌倦。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个所谓的名言,让这些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抢跑”会因为“违规”而被“罚”——让孩子在后续的学习中缺少新鲜感,进而厌倦学习。

家长从这个案例中应该吸取两个教训:一是要注意了解孩子对老师的态度,引导孩子尊重老师。对孩子造成伤害的个别老师,家长要及时与他们进行沟通,设法缓解紧张的师生关系,消除老师与孩子之间的误会。

二是千万不要急于“抢跑”——让孩子在幼儿园时就迫不及待地学习小学知识,而应该珍惜孩子在幼儿园快乐、健康成长的机会,以免孩子过早学习小学知识后,因缺少新鲜感而导致日后学习的索然无味。

赏识孩子赢得爱戴

两个在不同国家读书的初一小移民,事先互不认识,在国内学校也都有不俗表现,到国外学校读书的时间都很短,但对重新转回国内读书的态度却惊人一致:杀了我,也不想回国读书。难道国内六年的师生感情还不如与国外老师的短暂交

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值得老师和家长反思。

面对案例中出现的类似情形,国内老师大多会这样处理:家长给老师介绍孩子的情况,说孩子有哪方面的不足,老师一定会说,你今后要加强教育,协助老师做好相关工作;

关于成绩的评价,不考虑学生个体的实际,一定会按标准答案给出绝对的评价;

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基本没有选择;

老师给学生安排任务,基本上是命令或要求的口吻;

面对孩子所犯的错误,老师总是教育家家长该怎样怎样,更有甚者,把家长拉去训斥或批评一通了事。

没有比较,就没有发言权。也许这就是孩子用“脚”对国内教育投出“否定票”的根本原因。

案例中还有许多细节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比如,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孩子提要求,我们怎样看待师生关系。在国内学校,老师是权威,总是要求学生那样干那样干,很少考虑学生的感受和需求,至于以什么样的口吻与学生交流,更不是老师考虑的问题。

正如案例中的学生所说,国内学校和老师在教育过程中从来没有给学生足够的尊重,甚至很多时候,国内学校和老师对作为学校教育的最好伙伴的家长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

善于发现孩子的闪光点,用孩子的优点鼓励孩子,是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

(11)



但无论数据多少,总有些人觉得狼还是太多了,尤其是那些喜欢狩猎运动的有钱人和工厂主,他们视鹿鹿为行走的支票,而农村居民,不论暂时还是长期生活在没什么乐子的地方,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很多叫嚣甚凶的向导和富裕的狩猎爱好者甚至不是阿拉斯加居民。

至少少数阿拉斯加人,不管住在乡下还是城里,也不管是土著还是白人,对狼都没有敌意。相反,他们其实认为狼是一种资产。然而那些手握权柄的阿拉斯加人近来似乎呼声最高,倒向了“狼还是死了好”阵营。美国支持杀死狼的人在阿拉斯加境内展开了无差别清剿行动,设陷、下毒、空中扫射、悬赏追缉,无所不用其极。自1954年阿拉斯加州成立,直到20世纪90年代,杀狼行动持续不休,但并非没有出现过激烈的争辩和反对。20世纪90年代,两次市民投票动议(均由友人约尔·班内特领导)及三次州长干预暂停了杀戮;但2003年,新任州长弗兰克·穆考斯基上任后,杀狼计划重新兴起了,甚至有私人狩猎队驾驶飞机开枪扫射,影响面积相当于中西部数州。我们所居住阿拉斯加东南部并不在此清剿范围内——至少目前还不在此。

回忆了这段历史后的某一天,我滑行出房屋,发现一匹巨型黑狼几乎进入了我家后院——这个家伙不仅未与人狗相对立,还称得上很合群。这事看起来有点怪异,甚至有点不祥,但我无从先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这个事故会如何演绎。

1981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布鲁克斯山脉西部深处的科伯克-诺阿塔克分水岭的山脊上,疾风如刀,山脉苍茫,谷地冰原覆盖,驯鹿的足迹纵横交错,绵延着伸展至苍穹之下。一个清瘦的年轻男子在凛冽的北风中攀爬,一肩扛着0.35英寸口径的杠杆式卡宾枪,另一肩挎着一部普通的摄像机。在他上方的山坡上有一片平地,其边缘灌木丛生。斜照的银辉里,一只灰熊与一匹灰狼正在殊死搏斗——狼打着圈儿,猛冲着朝熊的臀部咬去,而熊急速回转身,发出声声咆哮。熊抓不住狼,而狼也伤不了熊,但谁也不肯退却。或许它们正为一只猎物进行交涉,或许狼在保卫它的巢穴,也有可能狼正像往常一样在折磨熊罢了。

起初青年在一英里之外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后来他干脆放下行李,跑向它们,跨越

密如织网的河道和羊胡子草丛,踩过从从矮小的霜红色桦树和片片松散的页岩攀上山去。还有最后两百码距离的时候,他已浑身汗湿,颤抖着穿行在齐人高的柳树间,相机备好,子弹上膛,虽然他不打算射击。他知道拍到照片的机会十分渺茫,也并非在迎接自我挑战。当然,他十分害怕——孤身一人乘独木舟穿越350英里,在远离人烟之处接近一头恼怒的熊,以及今生所见的第一匹狼。如有闪失,好几周内都没人会想起他;他也根本没有办法联络外界,只有将他投在此处的飞行员才知道上哪儿找他。尽管如此,他仍然听从内心的指引,朝着山上的熊和狼移动。

而上面那个年轻男子就是我。我一边迅速攀爬,一边透过饱经三十年风霜的镜头眯眼打量着,微笑笑了起来,像往常一样振奋。也许有些鲁莽,但那一刻我觉得来到阿拉斯加是值得的。我从小便时常在睡梦中看到大型肉食动物,虽然我在一个个风光如画的方地方长大,但这些地方除了动物园,根本没有这样的动物。大学时我搬到了缅因州的乡村,在那儿磨炼自己,但那仍然远远不够。我告诉亲朋好友,我要去阿拉斯加。我直接朝着地图上所能找到的最为荒凉的一个乡村进发,它位于北极圈内,地图中的方位在阿拉斯加州的左上角,距离交通枢纽上百英里远。那里是狼和灰熊的地盘,那里孕育着关于它们的一切存在。基本没有多想,我说去就去了。

从那之后,多年来我数次遭遇狼和熊,有时近到能看见它们眼中我的映像,周遭都是它们野性的气息

当我攀爬那座山的时候,我已经在科伯克河边上一个偏僻的因纽特人的村庄里居住了两年——可我对周围仍旧很陌生,靠着运气和年轻抵抗一切未知。我并没像之前打算的那样回到学校成为野生动物学家,而是找了一份工作,负责管理贸易站,并为大型动物向导整理行装。我曾乘着机动雪橇、小划艇和独木舟,甚至步行,穿越过数千英里的林区。但这一次旅行,我独自出发,深入荒野,邂逅自己始终深爱的这片土地,那又是新的突破了。这份彻底的孤独并不是几天、几英里的事情,而是旷日持久、山高水远的历程,穿过顶级猎杀者漫步的地方——树枝断裂的声音,气味盘旋的痕迹,远处山脊上移动的光亮,都不再如以前那般寻常。我不过出神了几分钟,狼和熊突然出现在那片土地上,像是迎宾员一般。我冲向了它们,毫不迟疑。

(9)

文天祥临危受命

夏日时节,南方的暑气很重,忽必烈下诏伯颜,认为“正值酷暑,如今我们已扼住南宋的咽喉,可以暂时休整军马,待到秋高气爽在起兵不迟”。伯颜马上回奏道:“宋人凭借江海,作困兽之斗,现在虽然已经扼住其喉咙,但是如今一鼓作气将其赶尽杀绝,很可能灭亡南宋的机会转瞬即逝。”忽必烈觉得伯颜所言有理,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术驻扬州,绝宋朝淮南之援。于是,伯颜分兵四出,一步步收紧对临安包围。其实,忽必烈对南宋“停战”的想法绝非因为天气原因,恰恰是因为蒙古内部统治不稳,他的注意力还大半放在北方,准备彻底平定诸王后再灭宋。伯颜一席话,使忽必烈决定先南后北。

一时之间,平时大读圣贤书,张口闭口都是仁义道德天理人心的宋朝各地官员纷纷降元,广德军、岳州、滁州、宁国府等州军皆投降,最终连镇守江陵的南宋京湖宣抚使朱禔孙和湖北都置副使高达也献城降元。如此战略大举,不战而降,对南宋各地的文武守臣心理震撼极大,朱禔孙又发檄各部号召“归附”,于是“归、陕、鄂、复、鼎、澧、辰、沅、靖、随、常德、均、房诸州,相继降元”。本来,阿尔哈雅一支孤军守鄂州,元朝一直忧心江陵宋军会合军进攻。至此,荆南大定,元军再无后顾之忧。

为此,忽必烈手诏褒奖进攻江陵的阿尔哈雅,并授叛将高达为参知政事,召朱禔孙入上都面圣。可惜刚刚走到上都地区的朱禔孙因病而一命呜呼,无福见到新朝天子龙颜。

元兵东下,“所过皆降”,唯独宋将李庭芝“率励所部,固守扬州”,并斩杀元朝派来招降的使者,时出金帛牛酒犒赏壮士,誓以死守,“人人感激自奋”。其手下姜才(原为孙虎臣前锋)更是频频出城与元兵交战,屡败屡战,身先士卒,身中多创,仍带伤勇斗。

8月间,身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诸军的张世杰率平江都统刘师勇和知寿州孙虎臣率宋军水军万余艘,列于焦山南北广阔的江面上。此前,他约张彦从常州率军趋京口(今镇

江丹徒),约李庭芝统军出瓜洲(今扬州东南),准备三路并出与元军决战。结果,张、李二人皆因故失期,只有张世杰孤军与元军对阵。张世杰久处军旅,秉性忠勇,但军事指挥方面却属平庸之才,水战更是外行。为示必死之心,他下令以十船为一舫,铁索互连,沉锚于江,非有军令严禁起锚。如此,就给元军留下了最佳的火攻机会。

阿术登山眺望宋军水阵,立刻大笑道:“可烧而走也!”于是,阿术先遣元军善射者乘巨舰进逼,火矢雨发,宋军“篷樯俱焚,烟焰蔽江”,宋军“死战,欲走不能,多赴江死”。元朝张弘范、董文炳等汉人将领又舍命冲杀,张世杰最终不支,与刘师勇、孙虎臣二人分头败走。元军获宋水军“白鹞子”精舰七百艘,杀伤宋军无数。

当时元军进攻的态势是,伯颜统主力直奔临安;阿尔哈雅攻湖南;宋都带等人攻江西并一举断绝宋朝东西纽带;阿术攻扬州方向,阻止宋军从淮东方向支援临安。

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风云变幻之时,宋廷把文天祥召至临安,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文天祥临危受命,立刻上书道:

本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乱,解除了各路藩王的兵权,建立都城,虽然足以消除诸侯尾大不掉之弊端,但现在国家危难,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沦陷,痛悔何及!如今之际应该将南宋境内分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阊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阊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阊于番禺,以淮西益淮南而建阊于扬州。贵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禺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广人多,乃足以抗敌。齐心协力反抗元军,有进而无退,日夜疲扰元军,彼(元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机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退也。

疏上,“时议以为迂阔(迂腐而不切合实际),不报”,只下令文天祥知平江府。其真正“迂阔”的并非文天祥,而是那些庸碌无为的朝中大臣。

然而在专制政体下,官场沉浮和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粪土上浮。宋朝最崇尚文官政治,最优礼科举出身的士大夫,这与其他朝代,包括待士苛刻寡恩的明朝,形成鲜明对比。

(141)

